

主编 苏天钧

北京考古集成

6

侯仁之题



北京出版社

北京考古集成

金元

北京出版社

目 录

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	齐 心(1)
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辽金城垣博物馆·····	范 军(7)
金中都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赵福生(10)
北京考古成果填补金史研究空白·····	孙 玲(11)
金中都·····	阎文儒(12)
金代的中都·····	苏天钧(17)
金中都兴衰过程考·····	韩光耀(34)
兴庆府与金中都比较研究·····	沈 平(39)
金都与金上京比较研究·····	景 爱(43)
从金代遗迹遗物看金中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齐 心(49)
金中都城坊考·····	赵其昌(57)
金中都大内宫殿考·····	于德源(68)
金代朝日大明坛的遗址考·····	李继昌(72)
金中都的琼林苑·····	于光度(73)
北京历史上曾称“永安”·····	王 羊(77)
金陵初探·····	王德恒 王长福(78)
北京的另一座大型皇家陵寝——金陵·····	金 鉴(82)
金陵丛谈·····	齐 心(83)
金陵、金、房山及其他·····	苏宝敦(86)
金陵考古调查收获·····	金陵考古队(89)
房山县云峰山金陵·····	金陵调查队(90)
金章宗与“西山八大水院”考·····	张宝贵(91)
元大都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上的地位——纪念元大都建城720年·····	徐芊芳(92)
关于元大都研究的几点意见·····	陈高华(94)
试论元大都城垣与城市建设·····	葛建军(96)
北京元大都与日本平安京城址比较研究·····	沈 平(102)
元大都城与明清北京城·····	孙侯仁(106)
从《马可·波罗行纪》看元大都·····	沈 平(125)
关于《马可·波罗行纪》中元大都问题的疏证·····	张 宁(130)
谈元大都的城墙和城门·····	王灿炽(137)
元大都的园林·····	于光度(145)

元大都钟鼓楼考	王灿炽(119)
北京地区现存最大的古驿站遗址——榆林驿初探	王灿炽(154)
古运河码头张家湾	隋喜文(159)
金口新河考辨——大都运河研究	蔡蕃(161)
不朽的建筑——元太史院	陈晓(166)
铜局村和卧佛寺	张先得(167)
记元大都出土文物	张宁(169)
元大都发掘的青花和影青瓷	郭演仪 陈尧成(176)
从元大都出土的青花瓷器试探青花瓷的起源和特点	赵光林(181)
北京地区出土的元代青白瓷	刘秀中(185)
大都城的青花瓷及元青花瓷外销	刘树林(188)
十四世纪青花大盘和元代青花瓷器的特点	冯先德(193)
元大都遗址出土铁器分析	王可 韩汝芬 杜蕻运(195)
记元大都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物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元大都考古队(203)
北京西厢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	王有泉(206)
金中都水关遗址在右安门外出土	祁庆国 朱志刚(211)
金中都水关遗址	王有泉(212)
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面发掘	孙玲(213)
北京金蓝发掘简报	袁进京 王武钰 赵福生(214)
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金墓	李华(228)
北京天坛公园内发现古墓	喻震(231)
北京市房山县发现石椁墓	张先得 黄秀纯(232)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	刘精义 张先得(235)
北京先农坛金墓	马希桂(242)
通县发现金代石棺墓	周良(246)
房山区沙窝村发现金代墓葬	扬亦武(247)
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	秦大树(248)
北京王佐乡金代女真贵族墓	王武钰(257)
海淀区南辛庄金墓	王宁(258)
门头沟金代壁画墓	王策(259)
乌古论元忠等三墓志考略	贾敬颜(260)
金代韩弥墓志考	齐心(263)
金张蛟墓志考——兼论张氏族系	齐心(269)
金代乌古论窝论、乌古论元忠及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考释	赵福生 王武钰 袁进京(274)
北京房山区石楼村金代墓碑考	扬亦武(292)
金赵珪墓志	明智(296)
金窝鲁欢墓志考释	鲁琪(297)
金《张汝猷墓志》考释	侯瑛(300)
从论博言墓志谈吐蕃噶尔氏家族的兴衰	陈康(304)
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元大都考古队(309)
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	王璞子(320)
北京城最早的水库——昆明湖	侯仁之(339)
元土城的印象	王頔 依群(341)

酈道元与《水经注》	侯仁之(342)
昆明湖中的翁山泊西堤遗址	岳升阳(345)
安贞里与元大都	王德泉(351)
元大都城墙	王有泉(352)
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元大都考古队(353)
大兴县发现元代烧炭窑址与明代砖井	王武钰(366)
北京地区发现的元代墓葬	黄秀纯 雷少雨(367)
元铁可父子墓和张弘纲墓	喻震 黄秀纯(396)
元《铁可墓志》考释	侯 珂(415)
北京出土的元铁可墓志铭	黄秀纯 喻震(420)
北京市密云县元代壁画墓	张先得 袁进京(423)
密云元代壁画墓	祁庆国(427)
朝阳区发现两座元墓	王有泉(428)
北京地区发现两座元代墓葬	北京文物研究所(429)
怀柔梭草村发现元墓	苗富田(431)
元代张弘纲墓志及其事迹考索	黄秀纯(432)
北京西缘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 元大都考古队(436)
元大都白琉璃窑址	赵光林(446)
北京良乡发现一处元代窖藏	田敬东(447)
北京昌平县出土元代影青瓷	马希桂(451)
元青白釉釉里红玉壶春瓶	刘秀中(453)
青白釉艺术杰作——多穆壶	刘秀中(451)
北京地区首次发现古船	王有泉(455)
北京门头沟区发现一处金代窖藏	鲁 琪(456)
宋哥窑鱼耳炉	陈润民(459)
金代磁州窑人物瓷枕	故宫博物院总保管组(460)
海淀出土一件磁州窑瓷枕	高二跃(461)
通县出土金代绿釉刻花瓷枕函	周 良(463)
金代的八仙过海纹饰镜	程瑞秀(464)
怀柔出土金代铜镜	石柱玲(465)
馆藏金代官印考	叶 波 薛 婕(467)
金正隆二年银铤初探	鲁 琪(474)
北京市发现金代铜则	鲁 琪(479)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收藏的一副金代木桌椅	白荣金(481)
通县唐大庄出土金代陶砚	鲁 琪(485)
龙泉务村的三座金代经幢	李元强(486)
关于京畿都漕运使王君去思碑	张 宁(487)
永定河西岸出土石犀牛	王有泉 姚润生(491)
故宫藏元八思巴字印及相关问题	叶其峰(492)
记北京发现的元代铜权	张先得(496)
元代铜权——中国度量衡溯源	高桂云 程长新 程瑞秀(499)
北京出土的一件铜火铳	刘俊琪(501)

元明火铤的装置复原·····	王荣(502)
元代仿古龙纹三足索耳鬲炉·····	高桂云(506)
北京市拣选一组元代铅供器·····程长新	张先得(507)
元代纸钞的历史见证·····	高桂云(509)
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	(512)
北京双塔庆寿寺出土的丝棉织品及绣花·····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	研究组(519)
元代棉织僧帽·····	刘秀中(521)
元人《揭钵图》赏析·····	李戈(522)
元颜辉《李仙像》·····	文金祥(523)
赵孟頫《自写小像》·····	穆益勤(524)
九峰道人《三骏图》卷考略及其他·····	余辉(530)
《析津志》及其著者熊梦祥·····	赵其昌(535)
《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考·····	杨亦武(546)
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	苏天钧(553)
大庆寿寺及其出土文物·····张宁	刘树林(561)
大周“朝元”年号之谜·····	包世轩(567)
卢沟桥的石象·····	孔庆普(568)
毛益《牧牛图》·····	赵苏娜(569)
顾安《幽篁秀石图》轴·····	杨丹霞(570)
元大都也里可温十字寺考·····	徐莘芳(571)
元大都《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校注·····	籍白(576)
北京牛街礼拜寺两方阿拉伯文的古刻·····	鹤恭(585)
北京牛街礼拜寺阿拉伯文墓碑来历质疑·····	姜纬堂(587)
牛街礼拜寺的筛海坟及阿文墓碑无可置疑——与姜纬堂同志商榷·····	刘盛林(591)
居庸关云台的西夏文·····	沈 平(594)
居庸关云台的保护和修缮·····	胡一红(597)
居庸关过街塔考稿·····	籍白(600)
北京昌平银山宝塔群调查·····于杰 吴梦麟	赵 迅(614)
北京妙应寺白塔·····	赵 洛(626)
关于北京妙应寺白塔的创建年代·····	于 柯(629)
潭柘古寺归云塔·····	包世轩(631)
万松塔下忆万松·····	黄春和(632)
北京智化寺发现元代藏经·····	许惠利(633)
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	容肇祖(642)
大兴发现寂照大师行迹碑·····	刘振海(644)
房山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	徐自强(645)
北京护国寺的石狮·····	贾敬颜(647)
也谈《重建龙泉大历禅寺之碑》的年代·····	言 之(648)
山岩上的买地文书——记新发现的崇化庄摩崖刻字·····刘德泉	李元强(651)
鲜于枢及其行草书《进学解》卷·····	刘 恒(652)

近年来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研究

齐 心

公元1125年,金攻占燕山府后,改燕京为南京,天德元年(1149年)完颜亮弑熙宗而继帝位。1151年颁布《议迁都燕京诏》,1153年宫城竣工,海陵王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改南京为中都,改析津府为大兴府。“迁都”不仅在金代发展史上标志着一个新阶段,而且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此,北京正式成为都城,一直沿袭到元、明、清,至今,已具有840年的历史。八百年前的金中都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城市,可惜兴建不到一百年,就遭到一场浩劫,宫城变成一片废墟,现仅存三处长仅几米的城墙遗迹。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几年金中都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北京史与金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调查始于五六十年代,许多学者都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与钻探,从奉宽《燕京故城考》到周耿《金中都考》,从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到阎文儒《金中都》,初步弄清了城的规模、位置、城内外水系与园林。在此基础上于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配合北京市西厢工程这一国家重点项目,进一步开展了金中都城垣、宫殿区的考古勘测与发掘。西厢工程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北至天宁寺(辽塔),南达菜户营,贯穿金中都南北中轴线,涉及重要地下埋藏区。早在战国、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就在这一地区建立蓟城、唐幽州城,尤其辽代陪都——南京城和金代中都城的宫殿区也位于此。为了取得辽金宫殿区的基础材料,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共钻探15万平方米,发掘300余平方米,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及水井等。其中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约60米,东西残存60米,夯

土厚近5米,参照文献记载,基本确定此处即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宫殿基础上加以扩建的。通过钻探发掘,搞清了辽金时期夯筑特点(一层夯土、一层碎石头、每层约10公分夯实),取得了一批有地层依据的唐、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等实物标本以及宫廷遗物铜坐龙、铜镜等^①。

1992年3月—1993年4月,配合北京市西客站一期工程取得了考古成果。西客站工程地靠金中都皇家园林——莲花池(又称同乐园、西华潭)。在此勘探达60万平方米,取得较重要的发现。金中都西城墙从申州馆至莲花池的地下基础700余米。测定了古莲花池东、南、北三面界地,找到一段出水河道及一座湖心岛,在莲花池东部还发现一条年代早于辽金时期的古河道,这对莲花池水域形成年代的探讨颇有意义。古莲花池范围、出水口及诸河道的探明,为进一步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和金中都供水系统的状况提供了可靠资料。莲花池北门,即广安门外发现了古甘石桥遗迹和夯土区,这也为确定辽南京城垣及其护城河的位置提供了证据^②。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被国家文物局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水关(水涵洞)遗址,位于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南临京水河约80米。水关遗址保存基本完好,规模宏大,是目前国内已出土的古代水关遗址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处。

1990年秋开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工作者奋战一年,对遗址进行了全面揭露和细致的解剖,取得了水关遗址整体、局部及内部结构等方面的资料。

水关距地表约5米,呈正南北向。河水由城内

(北侧)流向城外护城河(今凉水河),南部是出水口,其平面呈Ⅱ型。水关全长43.4米,中间流水面部分长21.35米,宽7.8米,南北两端入水和出水口分别宽11.4、12.8米。水关建筑整体为木石结构,底面过水面距地表5.6米,最下层基础密置木桩,木桩之间用夹碎石及砖瓦沙土夯实,木桩之上放置排列整齐的大衬石方木。过水石下面的方木之间用水“银锭锁”相接,衬石方上放置石板,过水面的部分石板用铁钉与下面的衬石方固定,石板与石板之间用铁“银锭锁”连接,进出水口、泊岸两侧也埋有木桩,木桩、衬石方、石板紧密相连,整体结构合理、坚固,金刚墙及泊岸外侧用砂土夹碎石夯实,水关之上筑城墙,水关即在中都城景风门西侧的城墙下,是金中都城重要标志。这一发现具有重要价值:确定了金中都城自城西“西湖”(今莲花池)水进入中都城至鱼藻池(今青年湖)过龙津桥向南穿过丰宜门和景风门之间的南城墙上流入金代护城河的确切水源路线。“水关”是继卢沟桥之后,北京地区现有的又一处珍贵的金代建筑,而且其营建年代应早于卢沟桥(卢沟桥建于金大定、明昌年间,水关应是海陵王时期)。水关的建筑结构,基本上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卷帘水窗”的做法。因此水关的发现是此建筑方法的实物例证,充分显示了金中都的规模和建筑工艺水平。这一重大发现得到各界的重视与关注,1992年北京市批准在此建立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用以保护和展出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该馆基建工程已竣工,计划1994年底对外开放^⑥。

在金中都南城垣的护城河岸(今凉水河)边的沙土中,在距地表约2—4米深的淤沙中,发现一座金大定七年(1167年)墓表。墓表汉白玉质,由底座、表身、顶盖(重檐分为两块)三部分共四块组成,底座为凸字形方座,底边长85厘米,高24厘米。表身为一整块柱形方石,边长56厘米,高109厘米。顶盖为重檐四阿式,每层檐各用一块石料雕成,每层高22厘米,上檐宽77厘米,下檐宽90厘米。墓表通高265厘米。表文楷书,四面刻字,每面八行,满行27字,首题篆书“吕君墓表”四字,下刻“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户部员外郎蔡珪篆”、“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任询撰并书”两行字,墓主吕徽,其入《金史》记载。据表知微字良弼,世居燕地,号称豪族,娶妻赵氏,生有二子。表记记载吕徽一生曾从军戍镇阳,刘予主政开封时,被请为上

宾。原王(金太宗之子宗本)留宋京都,吕氏也在其门下。金世宗大定初,国库匮乏,吕曾捐钱千万,为自己及其子取爵。大定七年(1167年)四月六日病故,享年58岁,由此推知他应生于辽天祚帝乾统九年(1109年)。

墓表篆题者蔡珪,字正甫,丞相蔡松年之子,金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蔡珪知识渊博且识古文,历任编类官、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大定十四年(1174年)病故在山东潍州任上。蔡珪遗墨传世不多,其篆书尤为罕见,此表蔡珪虽只四字,也弥足珍贵。

撰书表文者任询,是金代著名书法家,《金史》有传。询字君谟,号南麓先生,金易州军市人(今河北易县人)。正隆二年(1157年)进士,大定七年(1167年)书此表时,任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六十四退休,家中藏书画数百轴,日夕展玩,悠闲自在,年七十卒。

任询书法造诣颇深,《金史》称其“书法当时第一”(也见元好问《中州集》);元《墓池湖海》称“南麓字流丽遒劲,不让二王”(二王:即王羲之、献之父子)。明代张廷纲《永平府志》也称“任询真草字书,气宽力劲,世宝传之。”

吕氏墓表,共864字。为其楷书代表作,骨力遒劲,结构工整,字体雍容沉雄中又不无灵秀之趣,据专家分析,许多字用笔都源于唐颜真卿,但其刚健、清劲风格也颇有柳公权笔风。任询楷书碑刻还有“完颜希尹神道碑”等^⑦。

2. 金陵考古调查、勘探收获。

金陵依山营建,绵延百二十里。明代天启初年遭到破坏。清代自称女真后裔,对陵墓进行了局部修整,修葺了太祖、世宗二陵,后来经民国年间、国民党统治时期以及“文革”一场浩劫,山陵遭到严重破坏。至七十年代已剩一片废墟。如今地面上建筑已荡然无存,但地面上仍有遗迹、遗物可寻。地下也常因农民植树耕地挖土发现文物。1986年以来,为了搞清金陵的范围、布局,进一步保护这一古迹,市、区文物部门拟定了“金陵调查”课题,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批准,开展了金陵勘查工作。首先采用物探方法,结合考古田野踏勘,经过市、区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对金陵的勘查工作在1986—1989年初步取得了可喜的收获^⑧。

金陵位于北京西南90余里的大房山下,主峰为猫耳山(又称九龙山,形如九条鲤鱼背似的山

脊)，两旁主山如屏，正中一出入口，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龙门口”。

金陵始建于海陵王完颜亮时期。贞元二年三月，他弑兄当了皇帝并迁都北京的第二年(1154年)，便派人在京郊寻找万年吉地。选中了云峰山下大洪谷龙街寺的风水宝地，于是便决定把祖宗灵柩从黑龙江阿城搬出虎水的上京迁于此。3月始修，5月竣工，可谓神速。正隆元年(1156年)，派人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又一次迎皇太后，又迁始祖以下十帝梓宫，共三次迁陵，奠定了金陵基础(《金虏图经·山陵记》)。

金陵范围《大金集礼》记载较详细：坟山禁界封堆西至周围地界，东至万安寺西小岭9公里，南至黄水岭13公里，西至辘轳岭13.5公里，太祖陵为其北界，方圆约计60平方公里。

金陵包括：帝陵、坤厚陵(埋葬后宫皇后、妃嫔)、诸王兆域(埋葬完颜宗室中有爵位的人)。

陵位的探寻

《金史》、《大金集礼》记“坟山”(今坟上村)，该村西北3里处即是龙门口，通称“皇陵区”。经三年多艰苦的深山区考古勘察，终于在云峰山下，发现并清理出金陵重要遗迹和珍贵文物。

《金图经》、《大金国志》记载太祖、太宗葬在大洪谷即龙门口的皇陵区，这里有重要发现：金世宗之父睿宗谥号碑一通，其碑采用汉白玉雕刻而成，螭首龟趺，碑额四龙吐须，尾托火焰珠，龙形独特。碑高2.1米，宽0.86米，厚25厘米。碑阳镌刻双勾体“睿宗文武肃肃皇帝之陵”朱地金书十个大字，分两行，每行五字，碑阴无字。据史载，睿宗是世宗之父，其陵名景陵。睿宗虽然没做皇帝，但其子世宗称帝后，追封父亲为睿宗，并从东北迁坟陪葬帝陵。据《金史·世宗纪》载，世宗遗诏：“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世宗兴陵即在太祖陵之侧，又与其父景陵距离不远，而清代重修金陵时，主要是修太祖、世宗二陵。这样分析看，这块石碑的发现，就为探寻三个陵位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段保存原貌的御道的发现又是一大收获。御道东西宽5.4米，南北长约3米。两侧在石质地袱上竖立四块两面雕刻牡丹行龙的汉白玉栏板和望柱。栏板前有两个蹲兽，栏板中间是线刻卷草纹七级石阶，形象地再现了当年拾阶而上直通主陵的一条神道。御道和石碑在同一南北中轴线上。沿着残存御道逐级前行，仍可发现许多残破零散在

地面的栏板、台阶，地面上、堰上残存大量汉白玉、青石以及花岗岩等建筑构件，有浮雕线刻人物、行龙、虎兽、牡丹、忍冬草、寿桃等纹饰，极其精美。还有龙头滴水、残龟首以及刻有莲花、几何纹的大、中、小各式汉白玉柱础。大量的龙纹、虎头纹等绿琉璃瓦当、滴水、兽头、妙音鸟，皆为世所鲜见。金代砖瓦和清代重修的建筑构件更是俯拾即是。这些遗物、遗迹都是勘查金陵范围、确定陵位的宝贵实物资料。估计地下可能埋藏着较丰富的文物。

据了解50年代曾出土残祝版哀册。

60年代此处出土过石羊、石马、石狮等石像生，后又掩埋了。1976年房山县文化局在此调查，发现两个青石砌成的祭祀坑，可惜其遗迹遗物已荡然无存。

为保护皇陵，环绕修筑防护墙。1986年进行调查时，物探探出一段墙基，经验证是墙基遗址，宽约1米，是花岗岩、青条石砌成。沿几条山沟修砌的泄水洞(如同暗渠)，洞掩在山里，水从洞中流出，泄到小河流出山外。我们发现皇陵附近的一条长60米、高1.2米、宽约1米，由花岗岩构筑的泄水设施。

还发现有人工开凿的石穴，穴东西两壁是用加工过的青石砌成，穴内是乱石填充，已挖深3米，还没到底，但因是陵寝重地，不允许再深挖，恐怕碰到龙脉，难以应付，只好暂停，待有关部门批准拟好方案后再继续发掘。此处十分重要，是否可能当年棺从此穴入室，其上再作宝顶，前而建享殿，这也许即是太祖睿陵之所在了。

享殿遗址 地面建筑已淹没无存，幸存殿基。1986年进行考古物探物测，发现殿基面宽16米，进深12.2米，用平面砖砌成，高出地面50厘米，上有纵横排列的石柱础四行，共16个，柱径30厘米。在殿周围有东西26米、南北约60米的残墙环绕。《金图经》、《大金国志》均记载：太祖、世宗葬在大洪谷。此处并有“瑞云宫”(现在皇陵村、龙门口一带)。1982年田野考古调查时，在此处发现一块残官碑。碑残文：“钦□瑞云宫，祖师□□正阳真人，门下提点，受□祖□□大师王道通仙……”碑之年、月字迹已看不清，但碑在太祖陵侧为道士建坟，并授官号，可见其崇拜之甚也。瑞云宫见于《县志》、《日下旧闻考》等书。

警宁官 是官员等人等祭祀金陵驻蹕的行宫。《金史》、《旧闻考》认为该宫是灵庙，1988年房山

县文物局进行调查,此地今名“洪寺”,明代称大洪恩寺,从其遗址看是三进院落,是否是金代警宁宫衍变为恩寺、洪寺,还需进一步进行调查确认。

道陵遗址 金章宗死于泰和八年(1208年)正月,葬入大房山云峰山旁的道陵。道陵是金章宗生前自己主持修建的。“道陵苍茫”是燕南八景之一,可见其宏伟。因此在元、明、清三代,道陵名气很大。

在现燕化东风街道后山坡上,从大峪沟、双泉沟往上是连泉顶(又称连山顶)上的辽代连泉禅寺,当年香火盛时,僧人300余人,今寺已成遗址。在此有一通嘉靖八年“重修连泉古刹”碑,碑文载:一僧入“前山游完金章宗古墓,后往从巔峰分林拔木至上”,这两句话,描绘出道陵大致方位,此处现为燕山东风果园林场内普光寺古栗树林一带,1986年文物踏查时,在此发现金代勾纹砖,绿琉璃瓦,汉白玉栏杆柱顶,四个直径约半尺的花岗岩柱础石,在山脊上有一条宽约2.5米从下而上用石板垒筑的古道。依山坡在杂草丛生处有二个隆起的茛丘,据此于1988—1989年北京市地矿中心对此进行探查,采用电磁法和传统的洛阳铲打探眼,发现地下有二处异常反映:在地下2~4米处,异常有规律,长9、宽6米呈半月形,异常前方有建筑基址和柱础石。再往前即是古路遗迹。

第二地点,异常更明显,呈“T”字形,南北长15米,东西宽25米。异常继续向北延伸6米,呈

甬道状,又打探眼发现深5米处全是外来的细黄土,在1米深处出土汉白玉栏杆柱头等遗物。

这里自然环境也十分优美,为两山夹峙,二水分流,背靠高山,泉水淙淙,树冠如倾,山前视野开阔,一望无际,这是处风水宝地。因此基于碑石记载和物探探测分析,这两处异常可能是金显宗完颜允恭的裕陵,另一处是“道陵”(章宗陵)。至于何时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尚待研究。

坤厚陵 始建于金世宗大定年间,大定十九年(1179年)11月竣工,是埋葬妃嫔园(后称“园寝”)。同时,也是早逝的皇后停灵的地方,以等夫君(皇帝)逝世,再迁出合葬,如金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就是先葬在此处,后迁葬世宗陵的。

根据考古调查,帝陵在阳,坤陵在阴。今房山大峪沟一带处在云峰山之阴,又发现金代遗迹遗物。另外在金世宗陵西侧小河边,依山有一片陵园。从方位看,此处既依山,又低于云峰山,地面又拣到许多勾纹砖等建筑构件。又据北京出土的世宗之女鲁国大长公主墓志记载:坤厚陵初成,奉迁明德(昭德)梓宫于土楼。(世宗)昭谓主曰:“汝惟长女,于事悉愚,吾以万国之重,不可亲往陵下之事,然已诏于东宫,汝宜往佐,其敬之,果以办。”从这段文字可知,坤厚陵建成后,迁葬乌林答氏,主持人东宫太子完颜允恭,协助人即鲁国大长公主。文中又提到“土楼”地名。史载,金陵范围内有大、小楼之名而没土楼,是否土即小或大?元代以后

北京房山区金陵一覽表

1	睿陵	太祖完颜阿骨打	位于九龙山大红谷龙街寺
2	恭陵	太宗吴乞买	位于坟山
3	德宗陵	海陵之父完颜宗干	位于太祖陵之侧,后被世宗削去帝号,故陵名未留下来
4	思陵	熙宗完颜亶氏	海陵削熙宗帝号,葬善香园,世宗时改葬碧霞谷。
5 14	始祖以下太祖以前的十位部落首领,从东北迁来,设置陵位,葬在十三坡(鹿门谷) 十陵:昭、定、水、泰、献、安、祥、光、弃、景陵		
15	景陵	世宗之父完颜宗辅	陪葬太祖陵,景陵碑发现十分重要
16	兴陵	世宗完颜雍	葬于太祖之侧
17	裕陵	世宗之子完颜允恭	先其父而逝,其子章宗完颜璟继位后,追父为显宗,陵号“裕陵”。
18	道陵	章宗完颜璟	燕山东风林场果园一带
19	海陵被贬为杨三,再贬为郡王,又降为庶人,改葬在金陵西南四十里,已无迹可寻。		
20	附南迁开封三帝 金宣宗 完颜珣		
21	金哀宗 完颜守绪		
22	金末帝 完颜承麟		

失载,但这无疑提供我们探寻坤厚陵位置的线索^④。

十王坟《顺天府志》载:“石门峪(鹅眉峪)北上有十王坟,金之宗藩也”,即指十帝而言。此十帝是海陵正隆年间从东京迁来入葬的。生前是女真部族首领,并未作过皇帝。熙宗天会十四年(1138年)追谥皇帝并定庙号的,皇统四年(1145年)定陵号。

大房山有一条向南延伸的山脉,叫“凤凰山”,中间有一段东西向的山沟,称“石门沟”。南面是鹅眉峪,西面是长沟峪,十王坟坐落在半山腰山坳里,占地面积60平方米,面向沟口,原有石砌的护墙,南部沟口有一道汉白玉栏杆,西部只剩残墙基了。地面上可拣到花岗石栏杆、华表残件、柱础、残砖碎瓦、阶条石、灯碗残片等。据说60年代这里曾出土过石羊、石马、石人等石像生。现在此处层层梯田,长满荆丛,很难进行踏查^⑤。

3. 龙泉务窑址的考古发掘

窑窑遗址位于北京西郊门头沟区龙泉镇龙泉务村北。三面环山,层叠叠嶂,永定河水由北而南自遗址东流过。遗址呈不规则长方形,西端以丁家场为界,向东至永定河西岸崖处,总长230米,南以村北修配厂为基点,向北宽120米,总面积27600平方米。该遗址系1965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经1975年复查而确认为辽金窑窑遗址。1983年村北修建水塔发现三尊较完整的辽三彩瓷佛及“辽寿昌五年”款识的三彩瓷片,曾引学术界广泛重视,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三年来,获得了丰富的科研成果。

龙泉务窑址是北京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北方辽金时代的窑窑遗址。现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共钻探3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000余平方米,出七各类器物4000余件,发现窑炉13座,其中6座有叠压打破关系,作坊遗址2处,各类灰坑、火坑、炉灶等30余处。初步探明了窑窑从辽至金历史发展的脉络。为研究辽、金时期北方窑窑及陶瓷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窑炉为北方常见的倒焰窑,平面呈长方形,由火膛、窑床、烟囱等组成。其中窑及火膛呈半月形,深1.4米,窑床宽3.5米,烟囱系由残匣钵垒砌。在其北侧发现用方砖铺地的晾坯场,面积约30平

米,周围散见烘坯火坑、地炉子等遗迹七八处。位于遗址西侧的T36,发现Y9、Y10、Y11三座窑炉叠压打破关系,无疑为我们推断窑址迄止年代提供了可靠的地层根据,特别是Y9,窑床面虽大,而火膛较小,其火力及温度必然小而低。据考古、古瓷研究专家学者认为,可能是烧制辽三彩窑炉;Y10结构完整而精致,全长约6米,宽2.5米,火膛呈半圆形,深1.2米。Y11叠压于Y10下,只保留两只烟囱及烟道。在上述三座窑炉北侧5米处亦发现一处建筑遗迹,室内遗存一处大锅台、石块垒砌坐炕及烘坯火坑。在堆积物中发现有铁工具:枕邦印模(内凹雕狮子头)、残佛莲座印模、佛头像印模、花卉模等,以及数量较多的各种型号的三角形三彩支钉。据此可推定Y9可能是烧制辽三彩的窑炉,而此建筑遗迹应是打模、制坯、烘干的作坊遗址。

特别是在村北水塔西北处又发现Y13(目前正在发掘中),从已暴露的窑床及火膛等遗迹观察,此窑炉保存较好,其火膛呈梯形,是全国首次发现的特殊窑型,时代大致为辽代中、晚期。

装烧方法主要是匣钵叠烧,器物中间用支钉或轮饼相隔,少量为单件装烧,三彩器皿多为三角形支钉支烧。值得注意的是,在装烧工艺中以两件匣钵相扣,内装器物亦相扣的对烧方法,是以往北方窑址中所未见见的。产品以盘、碗、碟、钵为主,其次有罐、壶、盂、盒、洗、炉、枕等生活用品,小型玩具、围棋子、瓷碗等。三彩器有碗、炉、碟及琉璃砖、瓦当等建筑构件。釉色以白色、乳白、灰白为主,也有酱釉、黑釉、褐釉、茶叶末釉及三彩釉色。其早期作品胎质粗糙,釉色灰白者居多,中、晚期作品较精致,胎质洁白坚硬,釉白而细腻,瓷胎最薄者仅2~3毫米,满釉,纹痕细小,应是辽代白瓷中上乘之作。其中以四龟避邪枕最为突出,造型奇特,为所见瓷枕资料中首次发现。

发掘材料表明龙泉务窑窑遗址始烧造于辽初,至金代停烧。产品主要流行于北京周围,北京地区辽金墓和塔基中出土的白瓷,很大一部分是龙泉务窑窑所烧,龙泉务窑窑的烧造工艺主要是受定窑的影响,也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

该窑是建国以来北京地区对辽金窑址的第一次科学发掘。国内外专家学者(日、韩、美、英专家曾来此参观)一致认为,该遗址规模大,遗存丰富,发掘此窑意义重大。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

同时也进行资料整理,相信不久会有更丰富的遗迹、遗物发现,为探讨辽金制瓷工艺水平提供更珍贵的实物资料^④。

4. 墓葬

金初“死者埋之而无棺槨。遗族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可见金初女真人的埋葬习俗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无棺槨之具。随着汉化的加强,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到了正隆、大定时期,埋葬习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简单的土坑墓发展到石室、砖室墓,从“无棺槨之具”发展到木棺或石函等葬具,从土葬发展到火葬。随葬品也由简单的马具、陶器、铁器发展到随葬瓷器、玉器、金银饰件等。而一般平民墓,仍然是简单的土坑竖穴墓,甚至没有任何葬具和随葬品。建国四十年来发现数十座金墓,近几年也发现几座重要金墓,例如海淀区四季青乡南辛庄发现一座长方形竖穴土圻石椁墓,椁内有一木棺痕迹,出土器物有绿釉刻花瓷枕、定窑刻花盆、定窑葫芦形水注、万字纹铜镜、木梳、篦以及一件精美的黑定小盏^⑤。

1993年通县帅府园胡同西口发现一座金代石棺墓,墓内出土影青刻花大碗等4件瓷器和27件陶冥器。其中置放在石棺盖上的方墓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墓志首题:“故保义校尉棣州商酒院使墓志铭”。志铭文:“公讳仲良,父大中大夫左;母商氏,郡君;妻郭氏,男棣,孙奴儿。时大定十五年八月十日改葬……”保义校尉自金代始设,元代承袭,明清取消;又金代太府监内设酒坊使,从八品,“掌酿造御酒及支用诸色酒醴”^⑥。

1990年门头沟区大峪村育新小学建筑工地发现一座金墓,为单室砖墓。墓门、墙为雕砖枋木结构。墓平面呈圆形,穹窿顶。墓室四角饰四组影作枋木结构的立柱和斗拱,将墓室分在四个部分,各部分均有壁画和砖雕影作枋木结构装饰。墓门两侧各绘一门吏,墓内随葬器物较简单,有白瓷碗5件、陶塔式罐8件,并有熙宁、大观、元丰等10枚铜钱。该金墓的壁画及影作枋木结构墓葬形制,

对研究金代文化具有重要价值^⑦。

房山区石楼村发现有金章宗时宰相杨瀛墓。此墓建于70年代平整土地时尚存华表及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等像生,80年代中期,村民盖房时,则仅余断碑,别无他物。据碑记得知,杨瀛与夫人马氏葬于石楼村“先茔”之次,说明此处是杨氏祖坟。结合《金史》本传:杨氏九世彦稠从后唐、后晋为官,后北迁入辽。瀛之曾祖永在辽为官,永之四子均为官。金继辽后,杨氏家道日隆,可考者自丘行四代十人,历金世宗至卫绍王六朝皆官职显赫^⑧。

总之,由于最近几年来北京城继往开来的新建设,配合工程建设,进行考古钻探与发掘,使得具有八百多年历史金中都遗址重放光辉;城垣遗址的调查,宫阙区遗址的勘查、发掘,水涵洞、河湖水系的钻探、发掘,金陵的考古勘探、窖藏、窖址的发掘,以及女真贵族墓、一般中小型墓的清理发掘,都出土了珍贵的文化遗存,为我们研究金中都城市,乃至女真族为主体的金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都提供了重要资料。

注:

- ① 王有泉等:《西厢工程考古发掘简报》,《北京考古信息报》1991年1期。
- ② 王策:《内厢工程考古发掘简报》,《北京考古信息报》。
- ③ 毛武柱:《金中都南城水涵洞发掘简报》,《北京考古信息报》。
- ④ 赵福生:《金代墓表》,《书法丛刊》1992年。
- ⑤⑥⑦ 金陵考古调查记录、金陵古物探记录、汇报、报告、房山区文物干部考古调查、汇报、报告。
- ⑧ 黄秀纯等:《门头沟龙泉务江金窑址考古发掘简报》。
- ⑨ 《海淀南辛庄金墓》,《北京考古信息报》1988年2期。
- ⑩ 周良:《通县发现金墓》,《北京考古信息报》。
- ⑪ 王策:《门头沟金代壁画墓》,《北京考古信息报》1991年1期。
- ⑫ 杨亦武:《房山区发现金杨瀛墓》。

金中都考古的重大发现与辽金城垣博物馆

范 军

金是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建都于北京地区的王朝，它的都城——中都，在中国历代都城特别是北京的都城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下诏迁都中都（改辽南京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城西南部），距今整整842年。《金史》记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征用民夫80万、兵夫40万营造而成，是当时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座城市。可惜这座宏伟壮丽的大城仅存62年便毁于战火。时至今日，中都城的地上遗迹几无处可寻，仅存三处长几米的夯土城墙。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时，偶然发现了一处建筑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配合施工对该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遗址出土后，经专家学者多次论证，确定是金中都南城垣下的水关建筑遗址。被评为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为永久地保护水关遗址并对外展出，北京市决定建立博物馆对水关遗址进行原地保护。于是一座以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为依托，旨在科学地保护遗址并通过该遗址和北京地区相关出土文物向人们展示辽金时期北京城市发展变迁历史的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诞生了。1995年4月23日，经过3年时间的筹备和建设，在纪念北京建城3040年的隆重纪念活动中，辽金城垣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座耸立在右安门外凉水河畔的博物馆，平面呈不规则多边形，其外形正是仿照古代城市水关的形式而设计，可谓独具匠心，与博物馆的性质和内容极为贴切。总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地上二层，地下一层即为被保护的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

作为遗址类历史专题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内

容主要围绕“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和“辽金时期的北京城”这两个主题进行展开，展览共分五个单元：1. 水关遗址概述及中国古代城市水关建筑的演变；2. 辽金以前的北京；3. 辽南京；4. 首都之始——金中都；5. 金以后的北京。其中第一、第三和第四单元为展览的重点。

一、水关遗址概述

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水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水涵洞”、“水窦”、“水津门”等。是由早期城内经城墙下向城外排水管道或渠道逐渐演变而成的。

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是一处木、石结构的水道建筑。上半部建筑已毁，遗留下来的基底部分保存完整，平面呈[]形，正南北向，南距今凉水河（金中都南护城河）50米，中都城内的河水即通过水关流入南护城河。遗址全长43.4米，过水涵洞长21.35米，宽7.7米，南北两端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分别宽12.8米、11.4米。底部过水地面距地表5.6米。水关遗址修建在永定河冲积地带的沙层之上，最下层基础密植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石及碎砖瓦、砂土夯实。木桩之上铺设衬石枋木，衬石枋上放置过水地面石，两侧砌石板墙。衬石枋与枋下的木桩使用榫卯结构相连接，衬石枋之间用木“银锭”榫相连接，衬石枋与石板以铁钉相连，石板之间用铁“银锭”榫相连。进出水口及泊岸外侧也钉有木桩固沙，称为“擗石桩”。木桩、衬石枋、石板之间连结紧密，整体结构坚固合理。最后在水关之

上筑城墙。为建造水关这一宏大的工程，使用了大量木、石、砖、砂石等建筑材料。木桩、衬石枋、木“银锭”榫等使用的木材均为柏木，柏木木质细密，耐腐蚀，是我国古代建筑常用的材质，建水关约用去1800根1~2米长的木桩。石质为青石，约用成材石料530立方米。银锭榫为铸铁，建水关约用了2500个铁银锭。从以上测算建筑材料的数量，大致可反映出修建水关时所用人工的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

水关的位置即在中都城丰宜门和景风门之间的南城墙下。它的发现，明确了西湖（今莲花池）水自金中都城西北进入城内经鱼藻池（今宣武区青年湖）过龙津桥后向东南的走向和经南城墙入护城河的确切地点。水关遗址是现在北京除部分金代城墙（现存金中都城墙有三处，即丰台区高楼村之西墙，万泉寺及凤凰嘴之南墙，为夯筑土墙）外所仅存的金中都建筑遗迹。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中体量最大的，其建筑形制与宋《营造法式》中“卷（jǔ）水窗”的规定一致，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

二、辽南京

北京的建城历史，距今已三千多年。早在殷商时期，北京地区已出现了居民聚落，西周、辽、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都城蓟的所在地，是天下名都之一。从秦汉到隋唐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蓟城一直是我国北方的军事重镇和贸易中心，直到契丹族入主中原。

从辽期开始，北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作为辽的陪都，从此揭开了北京首都地位的序幕。

辽朝实行五京之制，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在今内蒙昭乌达盟宁城大明城，东京在今辽宁辽阳，西京在今山西

大同，南京即今北京。在辽五京中，南京（又称燕京）是最大和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其规模大体是沿用唐幽州城的旧址，城址位于今广安门一带，周长约27里，城墙高3丈，宽1.5丈，配置有坚固的敌楼战檐，地窖三重。设有八门：东为安东、迎春，南为开阳、丹凤，西为显西、清晋，北为通天、拱辰。城内由皇城、宫殿、寺院、街巷、市场及球场等组成。大小街道整齐端直，大街为井字形，有4条横贯东西南北的主要干线。城中有26坊，每坊各有门楼，上面刻有坊名，有一些坊名应是唐代的旧称。三市位于城区北部，“陆海百货，萃于其中”。南京人口30万，居民皆着汉服，亦多有胡服的契丹人、渤海人等。辽皇帝经常在外游猎，即所谓“春水秋山”、“四时捺钵”制度，只在春秋季节，才到南京来作短暂的停留。辽历代皇帝崇佛，南京城内及近郊佛教寺院特别兴盛。著名的寺院悯忠寺（即今法源寺），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颂词；现今广安门附近的天宁寺塔，即辽代建的，是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也是我国现存密檐式砖塔中较典型的一座。

辽南京是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为金中都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三、首都之始——金中都

金朝承辽五京之制，其中都即为今北京。中都



城修建始于金天德三年(1151年),天德五年(1153年)宫城竣工。为在布局上尽量模仿开封城中皇城居于中央的形式,因此建城时主要扩展了辽南京的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扩展3里,城周长37里,实测18690米,略呈正方形。东城墙,在今虎坊桥偏西之南北线上;西城墙,位于广安门外西南凤凰嘴及其迤北一线;南城墙,在今北京南郊凉水河北约70米处;北城墙在今军事博物馆往南数百米,原会城门村旧址。

中都城的布局,采取外城、皇城、宫城回子形重重相套的形式。宫城区位于皇城内中央偏北,其面积与明清北京紫禁城的面积大致相仿。中路为金宫中轴线,主要殿、门都位于中轴线上。西路有御花园、鱼藻池及西苑,鱼藻池之北为妃嫔所居之西宫。东路分布有太子住的东宫、皇后住的寿康宫以及处理国事的内省政务机构。中都的城池、宫殿尽力模仿北宋汴梁城的建筑,甚至拆运汴梁宫殿的门窗构件运至中都,相传今北海公园塔山上的太湖石,就是当年汴梁“艮岳”的遗物。大安殿为金宫主殿,经钻探、发掘,已知其位置在今广安门外滨河公园迎春亭南侧,其夯土基础南北70米,东西残长60米,与文献记载的面阔11间相符。

中都街坊,是由街、坊、市构成。街:中都城有

13门,除东北角光泰门外,每边三门对偶,共有6条东西、南北大道。干线多以城门之名命名。如:彰义门街、丰宜门北街,此外还有以古迹建筑命名的街道。坊:唐代以前的坊,是封闭式布局,建有坊墙,设有坊门,辽南京的坊就是这种布局。中都的街坊设置除延袭辽旧坊的布局之外,在新扩展的城区所设的街坊均模仿北宋开封城的布局,打破了坊墙设置,以街设坊,按巷设坊。这种封闭式与开放式街坊在一个城市中并存的设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革。

中都的陷落:13世纪初,北方草原蒙古族兴起,于1210年对金发动了战争,1215年,攻陷中都,宫殿、城池多被焚毁。元代称金中都旧城为“南城”。直至元末,南城仍有众多的居民。至明代嘉靖年间修建北京外城城垣,中都故城湮没殆尽。

金中都及其皇城布局的设计,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元、明北京都城的设计开创了先例,元、明、清都城内的布局,大体上沿袭了金中都的布局。

北京文博 1995年2期

金中都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赵福生

1990年初,经国务院批准,市政府决定建设“西厢工程”,这是北京地区仅次于亚运工程的国家重点项目,是为了缓解北京西南部交通难而进行的大型市政工程。它南北连接二环和三环路,全长近7公里,共修建大、中、小型立交桥共47座,总投资超过10亿元。西厢工程南北贯穿金中都遗址中轴线,早在战国、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就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蓟城,唐为幽州城,辽为陪都南京城。西厢工程涉及的是重要的地下文物埋藏区。市文物研究所及时整理好有关金中都的材料,市文物局立即向市政府写紧急报告,得到了市领导的重视,市文物局长王金鲁局长亲自找有关方面交涉,终于取得了西厢工程总指挥部的大力支持,经过

五个月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取得了初步成果。

配合西厢工程所做考古工作,共钻探15万平方米,发现夯土13处,路土9处,水井、墓葬(明、清)十几处,重点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夯土遗迹,南北长60米,东西残长60米,夯土厚近5米,搞清了辽金时期夯土台基的修筑方法,并取得了大量的有地层依据的唐、辽、金时期的砖、瓦、陶、瓷等文物标本,参照文献记载,这里很可能就是金中都大安殿遗址,是在辽代宫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

北京考古信息 1991年1期

北京考古成果填补金史研究空白

孙 玲

北京作为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的历史,是从1153年金代把首都迁移到燕京开始的,至今整整840年。建国后,北京十分重视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工作,配合基建重点对西厢工程、北京西客站地下埋藏区进行考古钻探,对金陵进行调查,取得丰硕的成果,填补了这一阶段历史研究的空白。

在840年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改变,金中都城内外的建筑遗迹已逐步消失,除卢沟桥外,其他建筑只是在丰台区凤凰嘴村一带还存有断断续续的城墙残迹,其他有价值的实物几乎无处寻觅。据史书记载,金中都城位于现在北京宣武区西部的大半,周长37里有余,皇城在今广安门大街以南,中都内城中轴线有九重宫殿,是按北宋都城汴梁的宫室制度设计修建的。建筑极尽奢靡,大批木料和太湖石是专程从汴梁城掠运来的,现在北海公园白塔山上的一些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据说就是金代的遗物。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修北京外城时,金中都城被大规模拆除,以致于其后长时期内人们对金中都布局等具体问题一直不很清楚。

1990年,位于原金中都城遗址上的西厢工程、北京西客站建筑工程陆续开始。为探明金中都城的布局以及获取考古资料,北京市政府做出先考古发掘后施工的决定,并按专款进行钻探、发掘,共探查面积65万平方米,发现夯土、路土数处,其中一处边长60、约5米厚的方形夯土层与史书记载的金代中都城内最大建筑物——大安殿遗址相符。这就为准确确定金中都的城市布局等提供了佐证。

新建的北京西客站曾是金代西湖、园林集中

地,经先期考古测定探清了古莲花池规模,它的界地要比现在的界地向东扩展100余米,查清了出水口及诸河道,发现古建筑基础夯土区、湖心岛、古河道、古井等,这些重要发现为进一步研究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变迁和金中都供水系统的状况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为研究金代皇家园林风貌、探索金中都四子城或外郭城的历史悬案提供了依据和线索,为复原北京城市发展充实了资料。

为了研究金代陵寝制度,对金陵的考察也取得了较大成果。金睿宗陵碑、御道及雕有牡丹、行龙的汉白玉栏板、望柱以及大量刻有“龙纹”、“虎头纹”的瓦当、滴水、华表云板、像生、刻花柱础等,对全面了解金代的文化面貌有重大学术价值。

在众多的考古成果中,最重要的当属金中都水关遗址的发现,这座在地下4米处的水关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保存最好、最完整的遗迹,仅主体部分长度就达40余米,中间流水面有七八米宽,它对研究金中都城的建筑布局与结构、水系走向以及金代建筑法式都有重要意义。

12月3日,北京市文物局以召开学术报告会的形式,简朴而又热烈地纪念金中都建城840周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考古学家徐莘芳和齐心分别以《金中都——北京城市建设史上继往开来的里程碑》、《金中都的研究和金中都在中国城市史上的地位》、《金中都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收获》为题,向与会的100余名听众阐述有关金中都研究的几个重大学术课题。

中国文物报 1993年12月19日 第49期